

行为保险学系列(四)

风险判断偏差与非理性保险决策(下)

郭振华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173144)的资助。



郭振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副教授,兼任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上海保险学会理事。长期讲授《保险学》《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等课程,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上海社科基金项目各一项。

五、媒体报道与风险判断偏差

除通过自身经历和间接经验(观察自己周边发生的风险事件)来评估自己面临的同类风险外,更广泛而言,个体还会通过各种媒体报道来获得风险信息,如报纸、电视、互联网等。

显然,媒体对某些小概率风险事件的报道和讨论也会进入读者、听众或观众的记忆,增加他们对该风险事件的可记忆性和可想象性,并由此提高他们对此类风险的感知。而且,现代媒体的信息传递方式越来越多地采用视频模式,越来越生动、吸引人和容易记忆,由此,媒体报道会对人们的风险感知产生更大的影响。

(一)选择性媒体报道导致偏差的风险感知

媒体报道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为了博取读者眼球,满足读者对新奇事件的偏好,媒体在报道风险事件时是有选择性的。例如,对于死亡事件,媒体更愿意报道那些发生频率较低但属于灾难性的、新奇的或暴力的死亡事件,如恐怖袭击、火灾、溺死、谋杀、机动车事故、医疗事故、食物中毒等,但很少去报道那些发生频率较高但原因比较平常的死亡事件,如糖尿病、心脏病、肺气肿等导致的死亡事件。一项研究统计了某城市两份报纸对死亡事件的报道,发现尽管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交通事故的16倍,但关于交通事

故报道的文章数量却是关于疾病死亡的3倍,记录了几乎7倍于后者的死亡人数;尽管疾病夺走了100倍于谋杀的生命,但关于谋杀的报道文章,却是关于疾病死亡报道的3倍。

首先,媒体报道的偏差造成了人们风险信息来源或可回想例证的偏差,也就是说,由于媒体报道的影响,人们大脑的输入信息就是错误的。

其次,根据可得性启发式,可回忆信息的偏差自然就会引发人们的风险判断偏差。人们往往普遍高估了那些被媒体反复讨论的风险,低估了媒体不大讨论的风险。各种极端意外事件被人们高估,而各种其实比较常见的疾病风险反而被低估。

总之,那些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极端的、新奇的极小概率风险(如食物中毒),往往被公众高估;那些不被媒体关注的概率相对较大的普通风险事件,往往被公众低估(如糖尿病)。

(二)新奇事件的社会放大效应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一概率极低的新奇事件发生了,部分媒体对其进行了报道,该报道抓住了部分公众的注意力,引发这些公众的激愤和焦虑,这些公众开始与亲戚朋友们讨论并在互联网上传播,其他媒体看到了公众热点,也迅速跟进报道,媒体们竞相制造吸人眼球的头条新闻,继而引发更大面积和更深层次的焦虑,危险逐步循环性

升级,直至演化成一场危机,激发人们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花费巨大的管理措施。这一过程也可能会受到某类利益主体的刻意操纵而加速扩大。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和库兰将这一过程称为“层叠效应(Availability cascade)”,意指集体信念形成的自我增强过程。层叠效应显然极大地放大了某种风险事件的影响,使得公众对该类事件的感知程度急剧扩大,进而引发疯狂的风险控制行为。在中国201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流行期间,人们疯狂抢购板蓝根和白醋,有摄影记者竟拍到了白醋1000元一瓶的历史照片。

桑斯坦和库兰专门研究了美国历史上两大著名的层叠效应案例,一是纽约州拉夫运河事件,二是艾拉恐慌事件。1979年,拉夫运河中掩埋的有毒垃圾在雨季中暴露出来,引发水井污染超标并散发恶臭。这一事件受到关注后,引发大量媒体报道。美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一个名为“杀戮场”的节目将事件推至高潮,节目视频中,人们抬着婴儿用的空棺材站在立法机关门前,人们对有毒垃圾的风险感知被推到了极点。政府被迫出资将众多居民迁往外地,并出台了《环境保护赔偿责任法》,要求清理有毒垃圾点,设立超级基金负责清理垃圾和履行赔偿责任。保险业为此赔偿超过500亿美元。保险业曾想就此事与美国政府谈判,希望向政府的超级基金缴纳500亿美元了断此事,由此解除保险业对此类风险事件的所有赔偿责任,美国政府没有答应。此事还和石棉危机等一道造成了1990年代美国保险市场的责任险危机,即大量保险公司不再愿意销售部分责任险种,造成大量客户无法买到责任险。艾拉恐慌指的是1989年发生的毒苹果事件,当时有媒体报道,喷洒到苹果上用以调节苹果生长周期的化学品“艾拉”有毒,可导致老鼠得癌症,由此引发大量媒体报道和大众恐慌,很多人不再吃苹果。生产商回收了艾拉等化学品,政府对艾拉及同类

产品颁布了禁用令。事后研究表明,艾拉致癌的可能性很小。

桑斯坦和库兰的核心思想是,人们往往由于层叠效应而反应过度,严重高估风险,并引发花费巨大的风险管理行为,而这些钱本可以花费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以拯救更多的生命,如对引发死亡人数最多的癌症、糖尿病、心脏病等的防治进行投资。

六、近因效应、适应性与风险判断偏差

显然,在个体进行风险判断时,近期发生的事件会比早期发生的事件更易被从记忆中提取,从而对风险判断产生更大的影响,称为近因效应。比如,目睹翻车事故发生后,大脑中会有一段时间对该事故景象挥之不去,主观交通事故概率会迅速升高。

但随着时间推移,曾经发生的风险事件在大脑的诸多记忆中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被逐渐遗忘,个体对该风险的感知程度逐渐下降。其实,心理学家们很早就观察到人们对持续的刺激会逐渐适应,在心理学中称为“适应性原理”。例如,如果使人的视网膜受到一个持续的、强度相等的刺激,人们对该刺激的感觉会逐渐消失。人们的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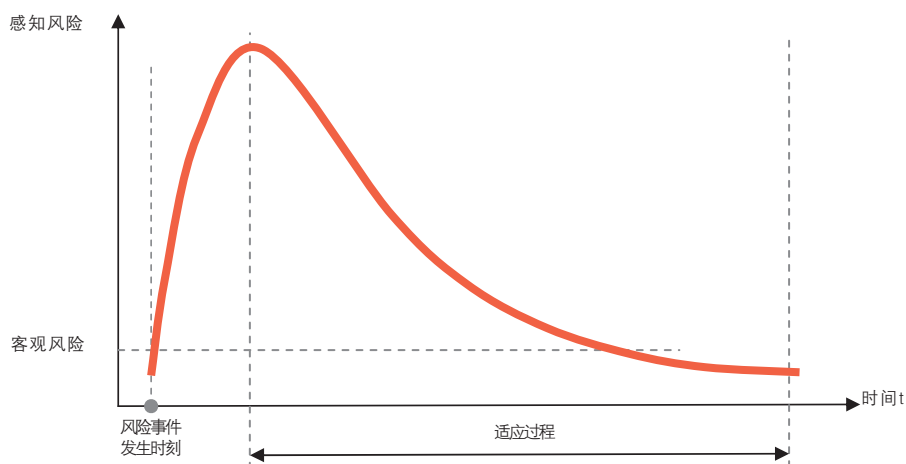
适应能力之后又被很多研究证实,例如,一项心理学研究表明,失去双腿一年后的截瘫患者与获得彩票大奖一年后的获奖者,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无显著差异;另一项研究发现,在亲人死亡后的一年内,人们的悲痛情感就会消失,回归正常水平。

将适应性原理应用于风险感知和判断,意味着人们对曾经经历的风险事件的关注度会逐渐减弱。可以想象,个体对风险事件的反应随时间存在这样的过程,起初是惊奇,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故发生了,随着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不断显现,个体的风险感知逐渐增加。然后,进入适应过程,个体会逐渐适应已经发生的损失和伤害,对该风险的关注度逐渐下降。可以预见,风险感知逐渐增加阶段的时间是相对短暂的,后续风险感知逐渐减弱的适应阶段时间则相对较长,因此,从风险事件发生时起,个人对风险事件的感知或关注度随时间会经历一个如图6所示的不对称倒U形过程。

七、性别、爱与风险判断偏差

(一)性别与风险感知偏差

大量研究表明,女性对健康和环境风险的感知大小高于男性。比较好的解释是,男



►图6 近因效应、适应性对感知风险的影响

性相对女性更多地参与了新技术的开发,从而对各种新技术更加信任;反过来,女性由于对新技术比较陌生,相对于男性更加不信任新技术,不信任带来了更高的风险感知。

众所周知,女性往往更多地考虑和关注家庭利益,尤其是对子女的更高关注,所以,对于同样的健康和环境风险事件,女性对事件影响的感知比男性更为深入,会在大脑中引发更多的联想,由此提高了自己的风险感知。而男性往往更多地将经历和思想放在了家庭之外的工作和事业上,对同样风险事件的感知程度相对较弱。

(二)爱与风险感知

爱的越强烈,越是怕失去,此时出险概率已经基本不被考虑,个体会将关注集中于损失后果上,进而处于担心中,引发过高的风险感知和过度的风险管理措施。桑斯坦将其称为“概率忽视”。在我国保险业有一种突出现象,就是很多家庭认为首先应该给孩子购买保险,而不是父母,体现了由爱衍生的过度风险感知。

八、过度自信与风险感知偏差

基于可得性启发式,那些没有经历过某类风险事件的人往往会认为“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例如,大多数驾车者都相信自己比普通司机的驾车技术更好,自己更不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比一般人更不容易生病等。虽然这样的感知并不现实,但未出险的个体仍然会由此认为自己的风险低于平均水平。例如,一个蹩脚的司机将汽车开得很慢,经常与前面的车辆保持很小的车距,但他跌跌撞撞前行却没有发生任何灾祸,由此,这个蹩脚的司机觉得自己的驾车技术还不错,而且事实表明确实如此。

(一)火鸡的故事

塔勒布在《黑天鹅》中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想象一只每天都有人喂食的火鸡。每次喂食都使它相信生命的一般法则

就是每天得到“为它的最大利益着想”的友善人类的喂食。直到第1000天时,在感恩节前的星期三下午,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它被宰杀烧烤后端上了餐桌。事实上,这只火鸡的思维与上述蹩脚的司机非常类似,被杀前,随着友好喂食天数的增加,火鸡越来越相信友好人类第二天会继续来喂食。虽然被宰杀越来越临近,它却感到越来越安全,在第1000天时,火鸡的安全感达到了历史最高值,随后却被宰杀了!如图7所示。

该案例形象地说明了,没出事的人往往会越来越自信,认为风险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风险却可能正在逼近。这是人类使用可得性启发式原则或经验决策法则的悲剧所在。

(二)证实谬误

心理学家将这种思维称为“证实谬误”,即人们只关注已观察到的部分,然后从它推及未观察到的部分,换句话说,人们只靠过去的经验作出判断,往往把“没有证据表明会出风险事件”当成了“证据表明风险事件

不会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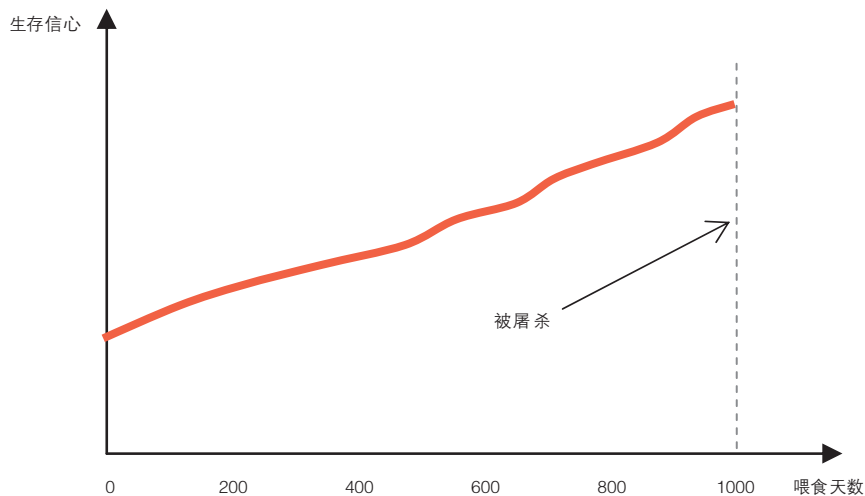
另一个有名的案例是关于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经过研究,医学界认为母乳完全可以在实验室里复制,所以完全可以用人工奶粉来替代母乳,却没有认识到母乳中可能包含超过当时人类科学理解能力的有用成分(实际上,母乳中确实有一些当时人类没有找到的营养成分),那个阶段相信此观点的母亲做出的用奶粉喂养婴儿的决定让一批人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包括更可能患上某种癌症。在这个案例中,医生们混淆了“无证据表明母乳具有优势”和“证据表明母乳无优势”的区别。

事实上,我们不能用某件事情的历史安全信息来预测接下来的风险,但是,这种天真的预测在所有事情中都存在。更要命的是,人们的风险判断容易出错,但人们却以极大的信心坚信这种错误估计。

九、风险判断偏差与非理性保险决策

(一)风险判断偏差总结

对于小概率风险,人们的风险判断呈现



►图7 火鸡的喂食天数、被宰杀与生存信心



人们只靠过去的经验作出判断,往往把“没有证据表明会出风险事件”当成了“证据表明风险事件不会发生”。

如下偏差:

从人群总体来看,多数人会低估风险,少数人会高估风险。出险概率越低,低估风险的人群占比越大,高估风险的人群占比越小。

从时间轴来看,从风险事件发生之时起,个人对风险事件的感知随时间会经历一个倒U形过程,即先是高估,然后逐渐变成低估。

从媒体影响来看,那些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极端的、新奇的风险(如食物中毒),往往被公众高估;那些不被媒体关注的普通风险事件,往往被公众低估(如糖尿病)。

尽管人们的风险判断容易出错,但人们却以极大的信心坚持这种错误的估计。

(二) 风险判断偏差导致的非理性保险决策

从保险公司来看,保险产品的价格包括

纯保费和附加保费,纯保费等于期望损失,用来覆盖赔付成本,附加保费用来满足赔付之外的各项开支和利润。从保险消费者来看,如果风险判断准确,就愿意支付纯保费,如果风险厌恶,就愿意支付风险溢价或附加保费。但是,在无法准确判断风险的情况下,消费者对期望损失或纯保费的判断就会与保险公司不同,进而导致非理性的保险决策。

具体而言,对于小概率风险,假定保险消费者具备所有理性保险决策的其他条件,上述风险感知偏差将使消费者的保险决策呈现如下非理性特征:

从人群总体来看,对于小概率风险,多数人低估风险将导致多数人认为保险价格过高,不愿购买。少数人会高估风险导致少数人认为保险价格过低,愿意购买。出险概率越低,上述特征越突出。这正是多数人不愿

意为小概率风险购买保险的重要原因。

从时间轴来看,个体对保险的需求强度并不稳定,从风险事件发生之时起,个体对相应保险产品的需求强度先走强,然后逐渐减弱。这一原理可用于解释为何在灾难(如空难)发生后人们的保险(如航空意外险)购买量会显著增加,但好景不长,一段时间后保险购买量就会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从媒体影响来看,那些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极端的、新奇的风险(如食物中毒),往往被公众高估,进而引发较高的保险购买意愿;那些不被媒体关注的普通风险事件,往往被公众低估(如糖尿病),人们的保险购买意愿较低。

尽管人们的保险消费呈现如上非理性特征,但人们往往以极大的信心坚持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SIM